

【国外马克思主义】

左翼加速主义批判

——兼论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

吴鑫

【摘要】传统加速理论始终强调技术与资本的联合,近年兴起的左翼加速主义则认为,资本体系无力掌控的技术能够产生破坏与变革的力量,因而技术加速能够成为左翼革命的新路径。然而,自2015年以来,左翼加速主义日益陷入衰颓的困境,面临被右翼加速主义吸收、转化的危险。造成上述危机的原因,首先在于左翼加速理论误解了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中不成熟的观点,在技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革命等关键问题上得出错误的结论;此外,左翼加速主义理论深度、创新能力方面的缺失,以及在行动纲领、实践目标方面的弊端,也是造成其困境的重要因素。左翼加速主义夸大了失控技术对资本的反噬作用,并断言技术加速必然带来资本体系危机化的加速与自行崩溃,却忽视了作为革命的基础与主体的劳动者本身,因而未能在根本上触及社会变革的实质。

【关键词】左翼加速主义;批判;机器论片段

【作者简介】吴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原文出处】《国外理论动态》(京),2020.1.25~3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与前景研究”(16ZDA001)的阶段件成果。

自2013年《加速主义宣言》《黑暗启蒙》等文章发表以来,“加速主义”理论逐渐成为国内外学界新的关注点,并且因其剑走偏锋的独特策略而引起了广泛争议。在国内,得益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良好发展势头,特别是与加速主义有着理论亲缘性的激进哲学家^①的知名度的上升,加速主义也迅速成为前沿热点问题。然而,国内学者关于加速主义的研究及相关表述整体上过于偏颇,在积极拥抱、肯定赞同之外很难找到质疑、批判的声音。实际上,左翼加速主义所津津乐道的“机器论片段”既不能代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观点,其本身也存在诸多局限;而在理论构建与实践目标上,左翼加速主义也面临诸多困境。近年来,右翼加速主义强势反超,左翼加速主义面临巨大压制,乃至存在被转化、吸收的危险,在加速主义理论的追踪与跟进研究中,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反思与批判的问题。

一、加速主义的兴起、分化及现状

“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作为一个特定术语,最早来自美国作家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②1967年所著的科幻小说《光明王》,书中所描绘的世界由一群拥有高度发达技术的人统治着,这些精英以神祇的身份接受那些将技术看作魔法、神力的无知大众的膜拜,而其中一群起来反抗的革命者则试图通过改变民众对技术的态度来将社会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罗杰将这群人称为“加速主义者”。由此向前追溯,加速主义早在20世纪初的未来主义运动^③那里已经初现端倪。也有学者将马克思看作是最早的加速主义者,其依据是马克思1848年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的这段话:“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

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④与加速主义有着密切关系的德勒兹、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等人则将“加速命令”追溯到尼采,后者在《权力意志》一书中曾写道:“欧洲人的协调乃是不可阻挡的伟大过程……应当加速而不是质疑这一过程。”^⑤

随着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高速发展,各类加速主义思潮纷纷涌现,它们往往都具有技术决定论、技术崇拜或乐观一进步主义文明论的倾向。不过,此时的加速主义并不带有特定的政治立场,更不具有革命意义。直到1960年代,德勒兹还曾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技术加速在造成压迫剥削的同时也带来了解放;加塔利甚至认为,被资本主义所改变和加速的生活对于受压迫者来说是一种“享受”。

加速主义转变为一种政治倾向并发展成为一套政治理论是在20世纪末,在2010年前后,加速主义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思潮。在这一过程中,加速主义分化为左翼与右翼两个派别,前者主张通过加速技术发展来冲破、拖垮并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一定的解放与革命向度;后者则将技术与资本的联合看作自然的、至上的存在,号召进一步解除对于技术和资本发展的种种限制,以推动社会走向无限加速。

作为加速主义的策源地,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在1980-1990年代聚集着一群思想激进的学者,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左翼加速主义先驱的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以及被誉为“加速主义之父”的尼克·兰德(Nick Land)。以兰德为代表的右翼加速主义的主要观点是:“社会—政治上的遗存形态通常会遮盖更先进的技术经济进程”^⑥,应当将技术看作一种自然的、独立的力量,人类应当适应并加速其发展,废除长期以来一直阻碍技术和资本发展的各种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兰德的这种激进立场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他的《黑暗启蒙》一文被后者视为纲领式文件。

新反动主义作为一种极右翼运动,可以被看成是右翼加速主义在北美的本土化与政治化。该理论强调资本与技术的联合所带来的公平竞争与适者生存,主张放弃自由主义的道德束缚,将用于无意义事

务(如平等、民主、多元等“白左”目标)上的资源转移到“自然”(即技术与资本本身的发展)上。与左翼加速主义不同,右翼加速主义者认为技术发展没有终点,更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他们主张无限加速技术并走向“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在政治上,新反动主义坚持“强权专制”与实用主义,认为在竞争之中产生的最强的政治体制才是最好的。为此,他们一方面反对自由主义,号召废除民主,另一方面如兰德所主张的那样“退出”社会,即放弃对现有制度的改革而寻求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不过,兰德本人虽然支持新反动主义,但多数新反动主义者并不将自己看成是加速主义者,仅认为二者在技术与右翼两个方面保持着共通性。

左翼加速主义实际上脱胎于右翼加速主义。费舍尔与兰德分道扬镳后,虽然也保留着华威时期的加速主义思想,但他逐渐看到了技术进步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立场随即开始向左转向。费舍尔以“K-Punk”为名的博客引起了一些志同道合者的兴趣,其中包括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二人于2013年发表《加速主义宣言》一文,标志着左翼加速主义达到成熟。左翼加速主义者主张革命与解放,但与传统左翼敌视技术、异化的态度不同,他们认为技术本身就能产生变革社会的力量,通过加速技术进步,最终可以达到加速资本主义崩溃的目的。因此,左翼不应抵抗现代性与技术,而应在保留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积极介入和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尝试“夺取技术领导权”,从而解放潜在的生产力。斯尔尼塞克与威廉姆斯宣称,传统左翼拉横幅、喊口号、进行游行示威的行动是一种地方主义的、平面化的斗争,他们“热衷于建造一个狭小和临时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空间……回避了在面对敌人时的真正问题”^⑦,这样的行动所追求的只是作为手段的民主(即赢得选举和获得协商权),却离真正的民主目标(人民的集体自主)越来越远。为克服这一弊端,他们提出“创造新的意识形态、新的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进行大范围的媒体改革,让大众掌握媒体”,进而构建“一种组织的生态学(即力量的多元主义)……将包含在后福特制的不确定劳动的形式之下、散布

各处的无产阶级身份凝聚起来”。^⑧

斯尔尼塞克还援引列宁、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并将他们也看作是加速主义者。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固定资本的叙述(即“机器论片段”)被左翼加速主义者奉为圭臬。有趣的是,1960—1970年代的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同样将“机器论片段”看成是马克思思想的“顶点”,并将其作为学派的圣经。因此,自治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奈格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等人与左翼加速主义有着某种理论“亲缘性”,《加速主义宣言》发表后不久,奈格里随即在同一平台发表《如何挪用资本主义的技术生产资料》一文,对其进行了回应与评价,奈格里对左翼加速主义表现出明显认同的态度。此外,奈格里提出的“一般智力”、“诸众”等核心概念与左翼加速主义也有着某种内在一致性。

值得一提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新一代学者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近年来相继出版《加速与异化》、《共鸣——一种世界关系的社会学》等书,与一些德国学者形成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学派”。然而,罗萨虽对社会加速持批判态度,但其解决方案却令人失望——面对社会加速带来的异化,罗萨要求我们调整自己,去适应加速并与之“共振”(Resonanz),“每个人都有共振轴……都有恢复共振的能力”^⑨,这种共振乃是消除异化、恢复主体精神以及赋予生活意义的唯一有效途径。我们看到,罗萨等人所谓的“加速社会批判理论”似乎已经失去了法兰克福学派原本的批判内涵,其对待技术加速的态度与德勒兹、加塔利的立场类似,并且,其所声称的个体通过“共振”去适应社会加速最终将导致技术异化、社会总体宰治的加深,形成恶性循环。从这一结果来看,罗萨无论如何不能被划入左翼加速主义的行列。

二、左翼加速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困境

费舍尔于2017年自杀后,左翼加速主义阵营开始崩分离析。其中一部分人转向“无条件加速主义”^⑩、“性别加速主义”、“零和加速主义”等阵营,另一些则被右翼加速主义所吸收。当前,左翼加速主义仅依靠斯尔尼塞克等少数人苦苦支撑,其在海外学界已经无法发挥影响力,陷于理论崩溃的边缘。

然而,国内学者对此却热情不减,这其中既有充满猎奇心态的加速主义爱好者,也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左翼加速主义持同情态度的学者。但无论如何,左翼加速主义当前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困境都是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

(一)困境一:理论厚度与创新动力严重不足

左翼加速主义自身理论的薄弱以及理论更新能力的缺乏是其濒临绝境的首要原因。从思想史来看,加速主义本身只是近十几年才形成的一股思潮,其影响力与具有厚重积淀的主流西方思想(如自由主义)相去甚远。此外,加速主义自诞生起就带有先天的右倾性质,脱胎其中的左翼加速主义既缺乏传统左翼思想的支持(这也与左翼加速主义者对其主观的排斥有关),又始终面临加速主义阵营内部的批判和压力,使得它很难发展成一种成熟的思想体系。

左翼加速主义的早期代表费舍尔是一名英国作家、文化理论家,其研究领域包括激进政治、音乐及流行文化,费舍尔在左翼学者中有一定的知名度,著有《资本现实主义:我们是否别无选择?》^⑪等书,并对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提到的“徘徊”(hauntology)概念有过深入阐发。费舍尔虽被看作左翼加速主义的先驱,但加速理论在其思想体系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左翼加速主义“新生代”的主要人物斯尔尼塞克在发表《加速主义宣言》时还只是一名博士生,虽然他近年来相继出版了《创造未来:后资本主义与无劳动世界》(2015)、《平台资本主义》(2016)等书,继续阐发了左翼加速主义理论,但其立场已经发生动摇,左翼倾向也大不如前。另一方面,奈格里等人虽对左翼加速主义持同情态度,但二者毕竟有着不同的理论视域,这就决定了左翼加速主义无法依靠前者获取思想更新的动力。当前,左翼加速主义的支持者多为一些年轻学生,其理论阵营显得极为孤立与孱弱。

(二)困境二:技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复杂纠缠

斯尔尼塞克等人宣称,技术加速将释放潜在的社会生产力,并将生产力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传统左翼批判技术和异化并拒绝现代化的做法与试图砸毁机器的工人的行为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大机器与技术能够为资本主义所掌握和利用,

同样也能够为工人阶级所运用。不仅如此,斯尔尼塞克还声称,已经为资本体系所掌控的技术之加速将带来资本主义本身的加速,从而促进其衰败和灭亡的进程。

表面看来,通过加速生产力的发展来变革生产关系,似乎是一条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路径。然而,左翼加速主义忽视了三个极为关键的问题。

其一,技术并不等于生产力本身,技术进步也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业革命发明的绝大多数机器和技术都转化为了生产力,那么在资本主义后期,技术的主要对象已经由外部自然转移到了主体人身上,技术在奴役人类、造成异化方面的作用已经超出了其在促进改造外部自然的生产力的发展上所发挥的作用。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已经批判过“作为机器零件”的工人的异化,而即便是加速主义者们也不得不承认,技术已经不再是人所能掌握的工具,相反,技术有自己的目的,它将人作为工具来使用。因此,技术加速虽有可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并引发变革,但更有可能带来主体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加速异化,将一切卷入到迷航之中。

其二,生产力的核心是劳动者主体,革命实践的核心则是劳动阶级本身,作为生产资料,技术与生产关系的纠缠比生产力更明显。单纯的技术变革并不能导致生产关系的革命,只有改变技术的主导权(即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维度),才能引发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斯尔尼塞克等人似乎也意识到,技术发展并不会带来问题的自动解决,技术也不会自发地转到劳动阶级的手中,因此“左翼必须提出社会技术的领导权”¹²，“建立自己的平台”¹³。然而,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斯尔尼塞克却避而不谈。以奈格里为代表的自治主义者提出了作为新的革命主体的“诸众”概念,在实践纲领与目标上也有详细论述,并给出了一系列具有可行性的方案。相比之下,当前的左翼加速主义理论所体现出的特征更多是描述性与口号化的。被视为斯尔尼塞克最新力作的《平台资本主义》一书,从事实角度阐述了数字资本主义平台的五种类型(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共享平台与精益平台)与三大要素(数据、节点、用户),并对平

台资本统治时代无产阶级的流动性、边缘化等特征进行了描述,但他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新形势下的革命策略与行动方向。从斯尔尼塞克将“数字平台”作为论述重点的做法,很容易看出左翼加速主义强调技术本身的革命维度、贬抑乃至无视革命者及其实践的一贯主张。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假使技术加速的确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并由此引发社会变革,其结果也未必是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在人类历史上,由生产力发展引发的生产关系变革与社会革命,其结果往往只是一种阶级社会代替另一种阶级社会,而共产主义革命与人类解放既要求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也要求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即阶级的消灭)。当然,左翼加速主义乃至当前的一些左翼激进学者虽然批判并试图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与危机,他们也号召解放与革命,甚至在理论上也大量借鉴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但在最终目标上却巧妙地回避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国家(阶级)消亡、平等自由、全面发展等的主张。左翼加速主义者热衷于谈论技术加速对现有秩序的破坏与摧毁,却极少论及目标与未来。借由这种对现实的政治经济批判,他们得以在形式上保留了左翼的面貌,但从本质上说,这些人看似与我们“同道”,但未必“同归”。遗憾的是,国内部分学者对此或后知后觉,或出于研究的需要而充耳不闻。

(三)困境三:加速引擎与苏尔特尔

在电影《雷神3:诸神黄昏》中,雷神索尔等人希望打败死神海拉,将阿斯加德的人民从其恐怖统治中解救出来。然而,海拉过于强大,众人无法将其击败。最终,索尔不惜孤注一掷,释放了被囚禁的苏尔特尔并给其戴上火焰王冠。获得永恒之火的巨人苏尔特尔立刻实力大增,将整个阿斯加德连同海拉一起毁灭,索尔则带领幸存的人们踏上寻找新家园的征程。

加速主义所寻求的策略与索尔的做法极其类似,斯尔尼塞克及兰德热衷于技术加速,呼吁解除技术发展的一切政治和制度束缚,正是出于对已经异化(并将继续异化)为不受人类控制的“技术怪物”的力量迷信。不同的是,右翼加速主义希望追随技

术怪物进入“超人类时代”，左翼加速主义则希望在技术怪物毁灭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后，劳动者与民众能够获得重建新秩序的空间与契机。

然而，这样的情节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上演。首先，技术怪物的释放绝不像给苏尔特尔戴上火焰王冠那样易如反掌。加速主义者对当前资本主义有意遏制技术发展的做法深恶痛绝，新兴技术面临着来自法律、道德、学科规范、经济逆全球化等方面的一系列阻力，每前进一步都极其艰难；另一方面，对于已经成熟且日益脱离掌控的技术，资本主义则有意将其引入到非关键的、无意义的领域（如符号消费），从而化解其潜在的失控危机。斯尔尼塞克等人竭力呼吁解除技术限制、加速技术发展，也从反面证明了资本主义日益加强的技术囚禁的力度。在《目的螺旋：关于加速的笔记》一文中，兰德提出了“目的螺旋”（teleoplexy）这一概念，即“资本—技术”所形成的自力推进的回路（circuit）将一切都拧入其中，成为一种生成中的、朝向未来的目的论。“目的螺旋式的东西……是加速主义真实的对象物……它除了自行资助其自身的探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⑩在这里，兰德认为，技术与经济形成的螺旋拥有吸纳一切的能力以及势不可挡的发展动力，“对目的螺旋超智能（teleoplexic hyper-intelligence）的理论理解不能被除了它以外的任何其他事物达成……加速主义存在仅仅是因为这项任务已被自动分配给了它”^⑪。显然，兰德比左翼加速主义者更加激进，也更加乐观。在他看来，技术怪物必将挣脱锁链释放自己，因为它自身才是最终的目的，在来自未来的力量面前，人类只是暂时的绊脚石而已。

与“目的螺旋”类似，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曾提出“金融轴”概念。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隐藏着一种‘金融轴’，它是一切秘密力量的来源。”^⑫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资本需要不断加快周转，随着“金融轴”的不断加速，越来越多的资本被卷入到瞬间就能被消费掉的产品中去。“金融轴”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本质，也向我们表明，资本主义经济有其自己的“轴心”，从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再到金融资本主义，经济轴心几经变化但始终发挥核心作用。一些学者用于描述当前现状的认知资本

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等术语，仅仅描绘出了其外在形式的变化，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经济轴心仍会是引力的核心所在。因此，不是技术螺旋将一切拧入自身，而是经济轴心将包括技术在内的一切卷入其中，在经济轴心面前，金融、技术、数据等都无法成为自身的目的。

再则，左翼加速主义是一招“自杀式进攻”的险棋，它必须在“被释放的火巨人苏尔特尔能否打败海拉”这一关键局中下对赌注。用斯尔尼塞克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赌的是，科技研究还存在着尚未开发出来的变革性潜能。”^⑬不仅如此，左翼加速主义者还需要赌赢另外两局：（1）被释放的技术怪物所摧毁的仅仅是资本主义体系，而不是整个世界；（2）在被摧毁的废墟之中，幸存的无产阶级与民众能够找到重建秩序的空间，并能够重新驯化技术为己所用。关于第一点，斯尔尼塞克一面强调人类社会资源枯竭、气候恶化、战争冲突等现实危机的严重性，一面将其归咎于“政治逐渐萎缩退却……想象力日渐贫乏”。相比于“技术产生的生态危机可以由技术来解决”的主张，斯尔尼塞克似乎试图采取更为曲线的策略，即先由技术加速解决政治问题（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再由政治手段解决生态问题。令人惊诧的是，国内部分学者对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多有附和，在他们看来，技术加速的“剃刀”带来的生态恶化、人的异化和淘汰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甚至不加思索地认定，被释放的技术怪物将首先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而非人类社会！他们乐于看到技术已经超出资本主义掌控的事实，但却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资本主义对技术的限制固然是为了维持其统治，但首先是为了维持人类世界的继续存在，因为没有人知道，技术加速最先带来的是变革还是毁灭。

20世纪初，列宁在处理组织问题时曾对“尾巴主义”提出过批评。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革命不需要由政党来领导，而应该让经济要素（如经济动荡、危机、罢工等）展开自身并充当革命的主角，当此类社会变革发生后，党应该抓住它的尾巴，进而“引导”革命。由此看来，左翼加速主义希望技术成为革命先锋的想法无疑是另一种尾巴主义。左翼加速主义过于强调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现有成果、技术与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离,但他们似乎没有想过,如果创造技术怪物的资本主义本身已经无法掌控它并被它摧毁,无产阶级又如何保证自己有能力抓住这头巨兽的尾巴并驯服它?

(四)困境四:组织形式与行动目标

斯尔尼塞克等人认为,资本主义能够根据左翼的斗争而进行自我调整,它已经对传统的斗争策略(游行、罢工、选举等)产生了免疫,因而传统手段不再能发挥作用。为了实现集体自主这一目的,《加速主义宣言》列出了一系列宏伟的目标:左翼应当夺取技术领导权,建立自己的“智识平台”,创造新的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让大众掌握媒体,构建“一种组织的生态学(力量的多元主义)……将散布各处的无产阶级身份凝聚起来”^⑧。

奈格里在评论上述主张时写道:“这一宣言对现有……以及2011年以来的社会运动的批判无疑是及时的。它有力地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这一主题、以及重新挪用并打断这一趋势的必要性。”^⑨在这里,奈格里突出强调了“趋势”与“挪用”(appropriation),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相比于传统左翼的固执与滞后,加速主义的确认识到了技术在当前资本主义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并提出了技术领导权这一关键问题。那么,工人阶级如何挪用资本主义的技术与生产资料?奈格里在文中并未交代,而只是简单地认同了斯尔尼塞克提出的建立平台、改革媒体等主张,并同样乐观地认定:“无产者确实可以重新挪用固定资本。这一潜能必须被解放……通过教育和对其科学的重新阐释,工人主体可以挪用它们。数学模型和算法并非必然服务于资本主义,因此问题不在于数学,而在于权力。”^⑩

于是,技术挪用变成了权力争夺。斯尔尼塞克认为,通过将平台导向公共目的、让大众掌控媒体、建立新的知识基础、充分利用技术等手段,能够重构阶级权力形式。不难看出,这一组织形式与奈格里的“诸众”极其类似。不过,与后者不同,加速主义所谓的“力量多元主义”在实践中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数据平台以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技术能否为大众所掌握,是值得深思的;技术能否在凝聚大众中发挥核心作用,也是十分可疑的。奈格里的“诸众”更

多寄希望于智识劳动者本身,因此至少具有某种政治—经济向度。相比之下,加速主义则“将计划托付给了客观性、物质性,以及发展的‘此在’(Dasein),因而它也相对低估了社会性、政治性和合作这些因素”^⑪。

加速主义指责传统的斗争是在回避问题,实际上,作为一种剑走偏锋的非主流策略,加速主义寄希望于在技术怪物摧毁资本体系后能够重新开局,显示出其在无力解决实际问题时诉诸极端化方案的企图。就连奈格里也不得不承认,被加速主义所批判的传统的“拜物式”民主确实在发挥作用。反观当今局势,无论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民粹主义对欧洲政局的冲击,无一不是依靠传统的政治—经济斗争与政党选举等手段所取得的结果。相反,加速主义不仅未能建立起一个能够领导技术加速的精英组织,也无法以有效的行动纲领组织起数字时代流动的无产阶级与大众。当年追随兰德建立“控制论研究所”的成员不久就沉迷于电子音乐、迷幻药以及各类新奇技术,该组织在没有取得任何研究成果的情况下迅速瓦解,兰德本人亦陷入了精神崩溃。现今的加速主义阵营则充斥着技术拜物教信徒、小说作家、未来主义者,他们的战场则局限于网络论坛、博客与科幻文学。这一事实让我们对加速主义的未产生深深的忧虑。

三、技术、劳动与剩余:“机器论片段”及其超越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固定资本”的部分一般被学界称为“机器论片段”。兴起于1960年代且至今仍保持影响力的意大利自治主义(工团主义)就将“机器论片段”看作是圣经式的文本,其代表人物奈格里、哈特、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等人强调劳动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独立性以及工人相对于国家、政党和工会的独立性,因而,劳动的分离与工人的自治就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瓦解。左翼加速主义者同样十分看重“机器论片段”,他们将马克思对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技术的描述理解为一种技术决定论,试图从单纯的技术维度论述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那么,“机器论片段”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呢?关于劳动,马克思写道:“提高劳动生产力和

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化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②,而“机器论片段”声称,随着机器体系自动化的日益提高与工人劳动的减少,劳动时间最终将不再是衡量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这一内在矛盾将导致剩余价值体系的崩溃。关于技术,马克思一方面批判作为异己力量的科学对工人的压榨,指出“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劳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被包含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③另一方面也认同“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④即肯定机器、技术的广泛应用是符合生产发展趋势的进步。

自治主义者正是基于马克思的上述论断而提出“从内部反对”的口号。他们认为,劳动与生产力能够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分离、独立出来并反对后者,而工人的斗争手段就是“反对工作,反对惯常高举劳动尊严的伦理,他们不想去重新适应工作(即接受新的生产方式),而是想减少工作”^⑤。工人必须自治,因为工会和政党只关心工资和劳动条件,只是想让情况变得更容忍罢了。^⑥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奈格里等人又将注意力集中到马克思“一般智力”的概念上。奈格里认为,生产中直接性的物质劳动在不断减少,而非物质劳动以及智识劳动在增加;维尔诺则反对马克思将一般智力看作固定资本的观点,认为一般智力是主体所具有的内在特性。针对这种变化,自治主义者提出,新的斗争主体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智识劳动者以及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统治下的民众。

如果说自治主义寄希望于(智识)劳动的分离以及劳动者和诸众的自主反抗,那么左翼加速主义则走得更远。后者认为,智识与技术本身的发展就能产生灭亡资本体系的力量。然而,“机器论片段”绝不能代表马克思的完整思想,其中的一些观点在马克思后期的文本(特别是《资本论》)中得到了修正。“机器论片段”认为,直接劳动是生产的决定性因素、财富的唯一尺度。然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机器自动化在带来直接劳动减少的同时也建构着一种更加社会化、系统化的抽象劳动,因此直

接劳动的分离并不能导致剥削体系的崩溃,反而会巩固与完善这一体系。此外,马克思还指出:“机器体系的出现不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是为了把现有的大量劳动力压缩到必要的限度。只有在劳动能力大量存在的地方(工厂),机器体系才会出现。”^⑦这表明,技术的出现与存在始终是为了强化劳动剥削,不仅劳动无法与生产分离,一般智力、技术与劳动也无法分离。

令人欣慰的是,奈格里似乎已经认识到了这一关键问题。在对《加速主义宣言》的评论中,他犀利地指出,在对固定资本的重新挪用上,“宣言低估了生产的合作性维度的重要性(也更低估了主体性的生产),它倾向于认为技术和物质性因素不仅决定了生产力,也是劳动力的一切人类学变革的推动力”^⑧。奈格里之所以强调生产的“合作性”与“主体性”,正是因为信息时代的背景下,资本主义榨取剩余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在这里,奈格里区分了“剥削性资本”与“抽取性资本”这两个概念,并肯定了后者相对于前者的优先性。根据这一划分,即使直接参与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不断减少,即使单个工人的劳动日益减少并不再受剥削,资本仍能从整个社会的分工合作与每个人的生命中抽取剩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技术的进步使得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减少、自由时间增多,以至于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消失了,于是个人的所有时间都成了劳动时间。“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甚至比他们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螺旋已经将每个人作为智识劳动者拧入其中,资本的直接的、有形的剥削消失了,代之以无处不在的对个体生命本身的抽取。

对技术进步的迷恋是所有加速主义派别共同的特征。20世纪的传统加速理论强调技术与资本的联合以及这种联合对后者的推进作用,时至今日,技术加速、技术异化已经日益独立并超脱于资本体系之外。面对这种情形,右翼加速主义者选择完全投向技术本身的“目的螺旋”,并希望随之进入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未来社会,资本主义在这一社会的命运已退居次要;左翼加速主义者则希望无产者能够借助

技术加速形成革命浪潮,从而一举摧毁资本体系。问题在于,加速发展的不只是技术,资本体系、社会形态以及人类自身都在不断加速改变着,技术螺旋力图将一切拧入其中,资本周转的轴心也如黑洞般妄图吸入包括生命在内的所有资源,同技术与资本的异化加速相比,人类正日益丧失其主体性与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

如果说,资本统治下的人类社会是一辆超速失控的列车,那么如何避免我们的世界成为加速衰亡的资本体系的陪葬品?自治主义者认为,前进的动力能够从列车中分离出来,并希望产生这种动力的工人们能够拒绝工作、实现自治;左翼加速主义则认为,不断加速所带来的不可控的危机能够对列车的控制者构成挑战和威胁,在最坏的情况下,当列车与其邪恶控制者一同毁灭后,幸存的乘客能够重建新的家园。加速主义者对技术怪物所拥有的力量的想象性迷恋决定了这一路径只能是少数人的飞蛾扑火,然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忽视政治—经济这一核心领域内的斗争,更不会忽视革命主体的作用而将人类命运交由技术理性去支配,除了在列车跌入深渊之前夺取控制权并扭转其前进方向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注释:

①如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sri)、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等。

②罗杰·泽拉兹尼(1937-1995),美国著名科幻与奇幻小说家,曾获得三次星云奖和六次雨果奖。

③未来主义运动是19至20世纪的艺术运动,强调运动、自由的特质,对工业革命和技术发展表现出极度推崇的倾向。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5页。

⑤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下卷,吴崇庆译,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第575页。

⑥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ian (eds.),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 509.

⑦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2013, <http://criticallegalthinking.com/2013/05/14/accelerate-manifesto-for-an-accelerationist-politics>.

⑧Ibid.

⑨Hartmut Rosa,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Berlin: Suhrkamp, 2016, p. 331.

⑩无条件加速主义认为,技术加速无法控制,人们只能坦然接受,在理论上多论述技术及资本的不可控性,在实践方面对加速持“不作为、不干涉”态度。

⑪Mark Fisher,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Zero Books, 2009.

⑫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2013.

⑬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 129.

⑭尼克·兰德:《目的螺旋:关于加速主义和技术经济的21条笔记》,冯优译,2018, <https://site.douban.com/264305/widget/notes/190613345/note/659622039>。

⑮同上。

⑯宋朝龙:《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前景的展望——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专题评析》,载《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⑰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2013, <http://criticallegalthinking.com/2013/05/14/accelerate-manifesto-for-an-accelerationist-politics>.

⑱Ibid.

⑲参见《奈格里评“加速主义宣言”:如何挪用资本主义的技术生产资料》,澎湃新闻2018年3月14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10408。

⑳同上。

㉑同上。

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页。

㉓同上书,第776页。

㉔同上书,第777页。

㉕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董必成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页。

㉖有趣的是,斯尔尼塞克于2015年发表的《创造未来:后资本主义与无劳动世界》一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似乎是左翼加速主义有意借鉴自治主义思想的一个信号。

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0页。

㉘《奈格里评“加速主义宣言”:如何挪用资本主义的技术生产资料》,澎湃新闻2018年3月14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10408。

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7页。